

交易成本范式与新古典增长理论范式:方法论角度的思考

莫志宏

摘要: 经济增长和制度问题是经济学中两大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它们在新古典经济学内部都经历了从消失到复兴的过程。从方法论角度这并非偶然,不过在新古典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范式和交易成本范式,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加深我们对经济增长和制度问题的认识,这并非不存在疑问。因为,它们最为核心理论论断都是从与新古典理论相容的命题出发进行逻辑推演得到的,有关论断虽然具有逻辑上的真理性,但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样的鸿沟是不可能借助于新古典理论的工具箱来填补的。

关键词: 交易成本 技术进步 逻辑真理 真实世界

一、引言

交易成本范式是为了制度研究而形成,新古典增长理论范式是研究经济增长的,这两者似乎毫不搭界,有何理由要对它们进行比较?确实,就研究的领域而言,两者之间极少有重叠之处,但它们在研究的进路上、研究方法的特点上以及在所遭遇的困境上等两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为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最让人着迷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两大领域——制度和经济增长,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关注,但随着 20 世纪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确立,它们却逐渐地淡出了正统经济学的视野,直到 20 世纪中后期各自由于一些标志性事件——即索洛的 1956 年、1957 年论文和科斯 1959 年和 1960 年论文——的出现才重新恢复生机。恢复生机之后的制度研究逐渐围绕交易成本概念形成了所谓的交易成本范式,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围绕新古典生产函数而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范式。虽然在这两大领域内部经济学家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并不是不存在分歧,但从家族相似性的角度讲,它们确实都能够得上独立的研究范式以至于可以忽略其中的细微差别而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研究范式的形成表明相关的研究开始收敛,并朝着形式上的正规化方向发展。此时,不同的研究之间基于共同的研究方法或者纲领有了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学术的繁荣也由此产生。新古典增长理论范式的形成带动了对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而交易成本范式的出现则引发了对于制度研究的热潮。索洛于 1987 年和科斯于 1991 年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对他们各自在经济增长领域和制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的承认。

制度和经济增长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同时经历了一个由消失到复兴的过程,从科学哲学的角度

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比如,我们可以追问,为什么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形成的时候没有把制度和经济增长问题包括进来?是技术上的原因还是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或者这根本就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又比如,我们可以考虑:制度的演进和经济增长问题同时作为经济学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领域,它们居然同时被排除在最初的新古典理论范式之外,这是否与两个领域同时都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有关,而这种特殊的性质恰恰为新古典范式所不容?顺着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思考:为什么这两个最初为新古典理论范式所不容的两个领域后来又逐渐地为新古典范式所接纳?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实现这一点的?经历这样的蜕变之后的制度研究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它们的发展前景又如何?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本文中得到解答。

二、交易成本范式与新古典增长理论范式的诞生:保守的革命

众所周知,科斯所开创的围绕交易成本概念而形成的研究线路是由这样一个提问开始的:既然市场是有效的,为什么在现实中仍然有企业的存在?这个提问就其本身而言,是反直觉的——企业就在那里,没有企业就没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当然也就谈不上市场以及市场竞争了。但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样一个反直觉的提问引出了经济学理论中的大问题:即交易成本的存在性问题。具体而言,交易成本的存在(自科斯开始逐渐)被认为是企业(以及其他非市场的制度形式)存在的原因,而对现实中交易成本的变化以及构成因素的研究,就成了理论家们研究各种制度现象的开门钥匙。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开门钥匙,人们可以跳出过去的“黑板经济学”而直面现实了。如果说,过去新古典经济学就等于价格理论,其中,市场价格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而企

业——尤其是市场中竞争的企业——无非是用来解释市场价格形成的工具,或者说黑匣子的话,那么,科斯开创的交易成本范式则将研究的视野引向了过去所忽视的领域——企业(以及其他的制度形式);此时,传统的看问题的眼光被颠倒了过来:“企业”不再是理解市场的工具,或者说,市场机制的陪衬物,它本身变成了需要被(用市场来)解释的对象,只不过,在这样做时,市场被认为是解释不了现实中企业的存在,因此,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个概念。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科斯的提问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它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提问,即从一个“公认的”逻辑前提——市场是有效的——出发,逻辑地引出结论——即(因为市场总是有效率,因此)企业没有存在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将由该逻辑前提引出的结论与现实相对照,从而对该逻辑前提提出质疑;第二,通过对“公认的”逻辑前提进行反思,将研究导向与该逻辑前提不相容的另一个世界——一个被科斯认为更真实的世界。如果说,过去的经济学家眼中的世界是一个以“市场有效”为逻辑前提的不那么现实的世界,那么,现在通过科斯的发问,至少,我们可以说,在经济学家们的眼中除了过去的那个脱离现实的、黑板中的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它与“市场有效”假定不相容,而需要用新的概念即交易成本来予以统一。

这两个特点显然是相互联系的:正是科斯特殊的发问方式才使得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有效”假定上,进而才可能将其反面的现象——即一切不能由市场来加以解释的现象尤其是现实中企业的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来加以“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并不是试图打开企业黑匣子的第一人,在这之前新古典经济学内部人们对于企业本身所进行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一直存在着。这其中罗宾逊夫人和张伯伦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企业的“黑匣子”理论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这种威胁一度甚至被认为要掀起一场范式的革命,因为他们的理论危及到了作为新古典范式基础的完全竞争理论,使得市场——这只在完全竞争理论背景下被视为“看不见的手”——必须由“看得见的手”——即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决策——来加以实现。但那场新古典理论的危机最终由于各种原因被成功地化解掉了,随之淡出人们视野的是对企业内部治理以及决策的研究。对我们来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从不完全竞争理论视角出发没有能够最终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于企业的研究,而从科斯的反直觉提问出发却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对此问题当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科斯的反直觉提问是从新古典理论内部的基础性假定——即市场有效——出发,通过事后引入辅助性的假设即交易成本概念,在不对整个新古典理论的基石造成威胁的情况下成功地拓展了研究范围,而由不完全竞争理论范式出发的研究进路则只能导向非此即彼的结果:要么继续保留新古典理论范式,要么保留不完全竞争理论范式。在不完全竞争理论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

是在分析企业决策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数学上的不可处理性时,可以想像这场革命只能无果而终。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认为科斯发起的这条研究进路是一场保守的革命,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它对新古典理论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如果说过去新古典理论假定市场处处有效,那么,自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以来这个假定变成了: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市场有效;存在交易成本时,各种非市场的组织更有效率。显然,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后者并不构成对前者的否定,而只是将前者细化了、具体化了。

新古典增长理论发端于索洛1956年和1957年的两篇著名论文。索洛1956年的那篇论文其初衷是为了反驳哈罗德-多马的关于稳态增长的刀刃模型,但就其最终实现的理论目标而言,它说明了在只有劳动力数量外生可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以及产出的变动路径。显然,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或者说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数量的相应调整——至少,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经济增长几乎总是和单位劳动力所对应的资本数量的增长,也就是说资本深化有关,而并不是像索洛那样基于单位劳动力所对应的资本数量在长期中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讨论所谓的稳态增长以及增长路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虽然索洛1956年的那篇论文就其研究的理论问题而言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在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但他采取的方式并不是直视问题本身,而仅仅是为研究现实中的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基点。这个基点是反事实的,因为它抽象掉了现实中复杂的、数学上难以处理的各种导致产出变动的因子如技术进步,而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上。

反事实的参考基点当然不能直接拿来理解现实中的经济增长问题,就像物理学中不受力的物体的运动规律不能直接用来解释现实中物体为什么运动一样。不过,反事实的参考基点所起的作用是,通过把现实中的情况与它进行对比,或者,通过有效的“提取”从而凸显造成现实中有关现象的原因。而这,正是索洛1957年关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的论文所做的工作。在那篇论文中,索洛把各种可能的导致生产函数移动的因素放在了一起,用统一的技术进步指标A表示,通过分离沿着生产函数的移动与生产函数本身的移动,他最终实现对1909-194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虽然这个研究得出了一个看似明确的结论,即在1909-1949年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有87.5%靠技术进步的推动,但正如索洛(1957)随后所说的那样,从中我们得到的只是“某些(关于经济增长源泉)间接的启示”,因为,该研究并未提示我们,现实中的技术进步到底有哪些形态,它们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才能促进技术进步等。

这里,如果将科斯关于企业为什么存在的解释同索洛关于现实中经济增长的解释做一个对照,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就研究路径而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科斯从市场有效这个基点出发,将我们导向了一个现实中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所以市场并不有

效的世界;而索洛则从一个不存在技术进步的、由生产函数代表的技术水平出发,将我们导向了一个现实中存在技术进步的世界;科斯告诉我们,真实的世界中市场并不有效是因为存在着交易成本,而索洛则通过经验研究向我们表明,现实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的缘故。对我们而言,最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他们两者选择的基点都是反事实的,是与本质上静态的新古典理论相容的,或者,更严格地讲,是从新古典理论基础性的假定出发,但另一方面,他们所要解释的都是真实世界中的现象,因此需要偏离这个基点。

正是因为交易成本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都是从不与主流新古典理论相背离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演的方式告诉我们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说,它们都是保守的革命:说它们“保守”当然是指它们的出发点是保守的,说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革命意义,则是指它们的目标毕竟是要将我们导向一个真实的世界。

三、逻辑真理与真实世界:两者之间的鸿沟到底有多大?

新古典经济学总体而言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非常注重演绎逻辑的应用。从逻辑上讲,既定的前提与由该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具有同样的真理性:如果前提为真,那么结论也为真,反之亦然。某些对这套做法不以为然的人有时会这样指责:这无非是在进行逻辑演练嘛,推理的前提与推导出来的结论无非是同语反复,用不同的方式在表述同样的事情而已,而并不能增加我们的有关知识。是这样的吗?索洛(1958)对此的反应是:“任何演绎地推导出来的命题都是同语反复。我们只能说有些相对更明显,或者相对不那么有趣而已。”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索洛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的1956年论文所得出的一系列关于稳态增长路径的结论一方面当然是纯粹的逻辑演绎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却是并非是(从有关的前提出发)显而易见的。至于说由此得到的有关结论是否“有趣”,或者说,是否具有现实相关性,则直接取决于研究者的目的。从索洛自身所做的工作来判断,显然,其1956年的论文的目的并不是像后来的新增长理论家们那样,去直接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是作为一个反事实的参考基点,以此来说明现实。索洛紧接着于1957年对美国1909-1949年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可以说正是其1956年论文的逻辑延伸,是对其先前的理论工作正确的经验应用。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未真正理解索洛1956年论文的真谛,以为索洛所做的工作就是在解释现实中的经济增长。也正是基于这种误解,很多人将由索洛模型导出的有关结论——如各国间经济增长在长期中收敛——直接进行经验检验,而后来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则试图使索洛的模型更加地接近现实。不能想像,一个作为反事实基点的理论模型如何能够在经验世界中“证实”或者“证伪”任何事情?同样不能想像,如果研究者确实能够通过事先不断地添加新变量而使模型越

来越现实化,为什么还需要所谓的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直接指明添加进去的那些变量就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就可以了吗?

在我们看来,索洛所做的工作严格说来并不是解释了经济增长,而是从一个相反的方向表明了没有技术进步长期中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至于说现实中技术进步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其源泉在哪里,则并非由逻辑演绎可以解决的问题。对索洛来说,他并不排斥从经验的角度研究现实中技术的发生,而且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这项工作对于理解经验现实的重要性,但作为一个理论家,他的工作重点显然并不在此。与其他理论家相比,索洛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他的理论模型与现实的关系,尤其是,其对于理解现实中经济增长问题的局限性——他只是把他的理论模型用于间接地“解释”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宣称找到了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索洛可称得上是一名具有经验导向的理论家——他清醒地知道如何使其理论正确地与现实发生关联,而不是把理论当做纯粹的与现实无关的逻辑真理,也不是把理论不假思索地运用于现实。

与索洛模型的情况类似,科斯定理在本质上也是讲述一个逻辑真理,一个在无交易成本的世界中成立的逻辑真理。按照Dan Usher (1998)的话讲:“科斯定理的严格版本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命题:如果人们可以就一个有效率的结果达成一致,那么就会有一个有效率的结果。”前半句话在科斯定理中被表述成“如果交易成本为0”,后半句话实际上就是科斯定理中的“产权安排(就最终的效率结果而言)不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斯定理被很多人认为并没有带给我们任何新的知识,因为它只是同语反复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用索洛的视角来看,则仍然可以认为它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将无交易成本的世界中所发生的状况——即:如果没有交易成本,那么产权不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明确化了,使之可以成为与现实世界相对照的反事实的基点。而在这之前,至少没有谁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如果说不管是索洛还是科斯,他们所进行的逻辑演绎导向的都只是反事实的参考基点,而不是对现实本身的说明,那么,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最终使人们超越这些反事实的参考基点而真正地达到对现实本身的解释呢?对此,索洛和科斯似乎比他们的追随者更清醒。就索洛而言,他一开始就没有试图去解释经济增长——更严格地讲,解释现实中各种导致技术进步的原因,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目睹了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以后他更是明确地表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做法并不能真正地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要真正地了解现实中的技术进步,必须从微观的层次进行脚踏实地经验研究。就科斯而言,虽然他同许多新古典理论家一样非常注重逻辑演绎于理论形成的意义,但他同时非常强调经验研究,尤其是个案式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他多次表示,科斯定理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逻辑正确性,而在于提醒人们注意那个正交易成本的世界,而对于那个正

交易成本的世界,需要的首先是经验研究而不是逻辑演绎。实际上,正像在索洛面对技术进步不断地在以各种形式发生的真实世界一样,科斯也非常明白,逻辑真理只能作为反事实的基点来“反衬”不断变化的经验现实,至于对经验现实的真正解释,仍然有赖于琐碎的经验研究。

总之,逻辑真理和真实世界之间的鸿沟在索洛和科斯那里是不可逾越的。这种不可逾越性并不是作为研究方法的逻辑演绎与经验调查之间的不可逾越性,而是逻辑演绎的前提的反事实性与经验现实之间的不可逾越性——技术水平既定的生产函数(不存在技术进步的生产),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都是反事实的,都只存在于虚构的理想化世界中。

四、戴着镣铐跳舞的交易成本 范式与新古典增长理论范式

从实际的角度看,经济增长问题与制度变迁问题几乎可以说是经济学的最为重要的两大块内容。静态的资源配置问题与这两者相比,更多地就像是城堡中的游戏,在面对真实世界中的问题时很少具有实质上的重要性,因为它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在制度和条件既定时的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而现实中往往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恰恰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技术进步,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制度变迁,或者说,某种特殊的制度安排的出现等。如果我们把技术水平或者制度看做(生产)函数的参数的话,那么,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问题关注的是参数不变时变量(即有关的资源数量)的变化导致的后果。不过,当研究者把现实世界简化为一个技术水平以及制度都不变的世界时,技术水平参数和制度参数其实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更不要说考虑参数的变化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为什么新古典理论将制度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这两大对于经济现实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排除出了它的研究视野。

但,现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分别把对技术进步问题和制度问题的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曾经作为既定的参数因而可以不予考虑的因子现在却成为了专门的解释对象。那么,怎么来解释现实中的技术进步,又如何来说明现实中制度的成因呢?

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来看,人们对于技术进步和制度成因的研究显然并不是在没有任何框框定势的情况下进行直面现象的经验研究,相反,由于存在着既定的理论工具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人们总是试图在这个既定的工具箱里寻找合适的工具来解决目前所面对的问题。例如,科斯(1937)就是试图运用边际与替代的方法来解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后来的关于企业产权问题的研究,很多人则运用最大化理性人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权安排;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则试图通过在传统生产函数中引入各种各样的技术进步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些研究所使用的工具——边际与替代、最大化决策、生产函数——都是新古典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在不存在不可逆的历史时间、不存在不确定性、可以进行连续决策的

背景下适用的分析工具。

但,现实中制度和技术进步是否真的可以运用新古典理论所提供的工具箱加以解释呢?在我们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原因包括:第一,制度问题从根本上讲源于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新古典理论根本不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通过引入数学上的概率运算,新古典理论家可以使未来被有效地“包含”在现在之中,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毫无障碍地推及到未来);类似地,技术进步也只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发生的,根本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从目前的技术水平逻辑地“推导”出未来的技术水平。显然,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是新古典理论所不能处理的(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做法完全是在自欺欺人,是将自己无知的因而需要探索的事情当做确知的事情来处理)。第二,新古典理论的世界是一个虚幻的、无摩擦的世界。不管是个体之间源于不确定性的策略性行为,还是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在新古典世界中都是被作为对“常态的”帕累托最优的偏离或扰动。相应地,理论家们在面对现实中的制度安排或者技术创新时,他们总是试图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拉”回那个静态的世界:不管是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努力还是试图将制度问题转化为最大化决策问题的努力,其实质都在于此。第三,从研究方法而言,新古典理论为了适应数学上的定量化需要而过于看重了市场或者说市场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得市场成为了某种完全外在于人的行为的、纯客观化的事物;市场在这样被“神秘化”的同时各种与市场的运作密不可分的制度创新以及技术创新自然也成了不可解释的“余值”。可以说,只要是以本质上静态的新古典理论为参考基点(交易成本范式和增长理论范式都基于市场有效假定),这个世界就是到处都充满了“余值”的经验世界,也是让(那些长期浸染在以研究静态的资源配置问题为中心任务的新古典理论中的)人们难以理解的世界。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本文最初提出的问题了,即:为什么制度和经济增长问题这两大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同时为新古典理论所漠视?答案是:这两大领域所涉及的问题都与以市场为中心的、静态的资源配置问题不相容,从市场出发既解释不了各种(非市场)制度的存在,也解释不了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对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这两大最初为新古典理论所漠视的领域又被重新拾起,这是否能够导向我们对于真实世界的更深入了解,我们的答案是:在新古典理论的静态世界中,余值——不管是技术进步余值还是制度余值——只能是余值;使它们不再成为余值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摆脱新古典静态理论的束缚,直接将它们置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像现在在这样一种不与新古典理论相冲突的、迂回的方式研究它们。

注释:

虽然科斯的重要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早在1937年已经发表,但他的思想开始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他在1959

年和 1960 年分别发表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社会成本》两篇文章,并且尤其是因为后者。

关于这场危机为什么最终没有导致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被抛弃的分析,参见 Phillip Mongin (1997)。

这里说的不可处理性主要是指:在非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通常将不会导致一个确定性的结果;而这种不确定性在数学上是难以处理的。

Richard G. Lipsey (2001) 称这种情况为“内部驱动的研究框架”:即它的产生不是直接源于经验世界中的问题,而是源于已有的理论模型(当然也间接地与经验世界有关)。

按照 Abramovitz (1956) 的说法,由于索洛余值不能够由传统的经济理论予以解释,因此余值的大小实际上是“对我们关于经济增长原因无知的度量”。

按照布劳格 (2007) 的说法,科斯定理无非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另一种表述。

按照 Solow (1994) 的说法:“实际上,那些试图通过将技术进步定型化、显性化来超越索洛等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做法并没有真正地面对问题本身,即现实中经济增长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新增长理论家们所做的无非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观察,将所认为的技术进步因子引入生产函数,然后就得出结论说,我的模型就是经济增长模型,我所引入的技术进步因子就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按照 Furubotn 和 Richter 的说法:“交易成本一定是处处存在的,这是由个体决策的性质所决定的”(1997, p.446)。

例如,在对企业产权进行解释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中,为了运用最大化理性人工具,研究者总是试图把现实中根本无法观察到的或者无法量化的变量如当事人对有关信息的了解予以明确地表示。这样的做法在具体的问题分析时,实际上往往也把真正的问题给“假设掉”了。

参考文献:

1. Abramovitz, M., 1956. "Resources and Outpu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8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6, Issue 1, pp. 5-23.
2. Blaug, M., 2007. "The Fundamental Theorems of Modern Welfare Economics, Historically Contemplated."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9, Issue 2, pp. 221-232.
3. Lipsey, Richard G., 2001.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Vol. 8, Issue 2, pp. 169-201.
4. Furubotn, Erik and Richter, Rudolf, 1997.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5. Mongin, Phillip, 1997. "The Marginal Controversy," in *Handy Book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pp. 558-662. London: Edward Elgar.
6. Solow, R.,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Issue 1, pp. 65-94.
7. Solow, R.,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9, Issue 3, pp. 312-320.
8. Solow, R., 1958. "Technical Progress and Production Functions: Repl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0, Issue 4, pp. 411-413.
9. Solow, R., 1994. "Perspectives on Growth The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8, Issue 1, pp. 45-54.
10. Dan Osher, 1998. "Coase Theorem is Tautological, Incoherent or Wrong." *Economics Letters*, Vol. 61, Issue 1, October, pp. 3-11.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22)
(责任编辑:刘成奎)

(上接第 103 页)

3. 改进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应侧重于科学决策、规范管理,在决策中监督,在管理中监督。要尽力避免因与监事会职责重合而出现的成本增加、效率递减的弊端。在人员方面,要建立专职独立董事制度。鼓励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在职或离职的企业家和有多年的职业经验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出任独立董事,使独立董事像注册会计师、律师一样成为一种职业,同时建立独立董事职业市场和行业协会,确保独立董事既能尽心为上市公司服务,又使其收入不与所任职的企业直接相关,防止独立董事作用异化。

综上,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由主体的监事会、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实施,应用于战略制定并贯穿于企业之中,旨在识别可能会影响主体的潜在事项,通过管理风险以使其限制在该主体的风险容量之内,并为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在实施企业整体风险管理过程中,要建立以监事会的监督为主干,主体中的每个人都对企业风险管理负有责任的机制:监事会负责企业风险管理的组织实施,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监督,并察觉和认同主体的风险容量;首席执行官(CEO)对企业的风险管理负有首要责任,并且应当成为主人;其他管理人员支持主体的风险管理理念,并在各自的责任范围内依据风险容量去管理风险;风险官、财务官、内部审计师负有关键的支持责任;主体中的其他人员负责按照既定的指引和条例去实施企业风险管理。

注释:

1985 年,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美国会计协会(AAA)、财务经理人协会(FEI)、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管理会计师协会(IMA)联合创建了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通常称 Treadway 委员会),旨在探讨财务报告中的舞弊产生的原因,并寻找解决之道。两年后,基于该委员会的建议,其赞助机构成立 COSO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 COSO, 专门研究企业内部控制问题。1992 年 9 月, COSO 发布《内部控制整合框架》(COSO-IC), 简称 COSO 报告, 1994 年进行了增补。这些成果马上得到了美国审计署(GAO)的认可,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也全面接受其内容并于 1995 年发布了《审计准则公告第 78 号》。由于 COSO 报告提出的内部控制理论和体系集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发展之大成, 成为现代内部控制最具有权威性的框架, 因此在业内倍受推崇, 在美国及全球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

Jensen, M. C. and Meckling, W., 1979. "Rights and Production Functions: An Application to Labor Managed Firms and Co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52 (4).

刘汉民:《所有制、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效率》,载《经济研究》,2002(6)。

Fama, E. and Jensen, M., 1983.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 pp. 310-325.

Fama, E. F., 1980. "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8 (2).

林毅夫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环境》,载《改革》,1995(3)。

⑪ Warfield, T. D.; Wild, J. J. and Wild, K. L., 1995. "Managerial Ownership, Accounting Choices, and Informativeness of Earning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July, pp. 61-92.

⑫ 赵德武、马永强:《管理层舞弊、审计失败与审计模式重构》,载《会计研究》,2006(4)。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曾国安、陈永清)